

多元话语分析： 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

谢立中

提要：客观主义社会分层论者将“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致力于探究支配着“社会分层”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主观主义社会分层论者则将“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致力于考察导致“社会分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与此二者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社会关系建构为“社会分层”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关键词：社会分层 客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 主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
社会分层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

“多元话语分析”是笔者从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引申出来的一种与实证主义、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等传统社会分析模式都有所不同的社会分析模式（谢立中，2006b）。它借鉴了在哲学、语言学、传播学、历史学等领域中形成的传统话语分析的一些技巧，将其与后现代思潮所倡导的多元主义视角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一种以“话语分析”和“多元主义”为特点的社会研究思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研究思路，在《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的分析为例》（谢立中，2007）一文中，笔者曾经以自杀现象的研究为例，将多元话语分析与现代主义社会学传统中的实证分析、诠释分析模式进行比较，具体展示了对个人行动层次的社会研究中，多元话语分析的特点及其与后两种社会分析模式之间的差异。在本文中，我们拟再以社会分层这种结构性现象的研究为例，对社会学中现有的诸种“阶级”或“社会

* 本文系“十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研究中的话语—文本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04BSH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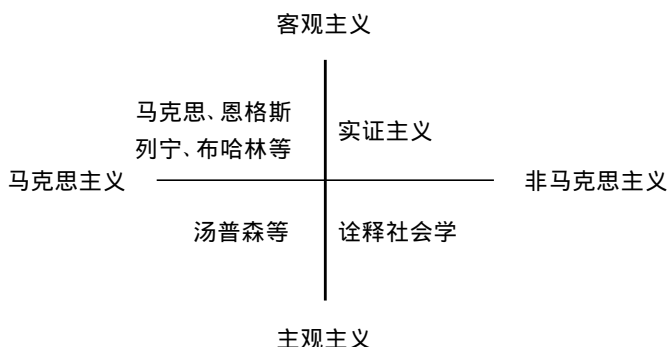


图1 几种传统的社会分层模式

在这几种模式中(参见图1),客观主义取向的学者一般都将社会分层现象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纯粹给定的客观性现实,主观主义取向的学者则将社会分层现象看作是一种由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起来的主观性现实;而在这两种取向中都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其中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是主张一种一元化的阶级分析,非马克思主义者则多受韦伯的影响,主张一种多向度的分层分析。然而,我们倡导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则和上述所有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模式都有所不同。

在多元话语分析那里,“社会分层”首先既不被看成是一种完全外在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也不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由某些相关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建构的产物,而是被看作一种在特定话语的约束下相关社会成员个人对某些“现象”进行符号建构的产物。^①具体说来,就社会分层这个主题而言,多元话语分析的基本观点如下。

(一)不存在所谓完全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纯粹给定的、自然的、等待着人们去认知和再现的社会分层状况

任何一份有关某个社会之分层状况的描述都不是对该社会“实际

^① 毋庸置疑,虽然任何一份有关某个社会之分层状况的描述都不是对该社会“实际存在”的分层状况的反映或再现,而只是相关社会成员个人在特定话语的约束下对某些“现象”进行符号或话语建构的产物,但这种符号或话语建构又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符号或话语的建构,而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建构。

存在”的分层状况的反映或再现，而只不过是人们话语建构的产物，是人们借助于特定的词语（概念）、陈述、修辞以及主题论证方面的策略来对人们所感受到的地位差异现象所做的一种界定和描述而已。因此，要想理解人们所谓的某种“社会分层”现象，我们就必须首先去考察人们以话语形式对这一现象加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基本策略（词语[概念]策略、陈述策略、修辞策略以及主题策略等）。

我们可以下面这段文本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文本 1:

现在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现在是在我国工业中独占统治的体系。在农业方面，我们有了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全部商品流转也都已经掌握在国家、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手中。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

由于苏联经济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

剩下了工人阶级。

剩下了农民阶级。

剩下了知识分子。

可是，如果以为这些社会集团在这一时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如果以为他们还是像在譬如说资本主义时期一样，那就错了。

在我国，资本家阶级已经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由此可见，苏联工人阶级是完全新的、摆脱了剥削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在我国已没有能够剥削农民的地主、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了。所以，我国农民是摆脱了剥削的农民，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集体劳动和现代技术的基础上的，其经济基础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

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由此可见，我们苏联的农民是完全新的农民，这样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

我国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文化工作者以及所有职员等等）也已经不是那种企图使自己超脱各阶级而实际上大多数都是为地主资本家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成分改变了，其中80%至90%都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活动的性质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定为富人阶级服务，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他们一定为人民服务，因为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现在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力的成员。由此可见，这是完全新的劳动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的。

这些变化说明什么呢？第一，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距离正在日益缩小；第二，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经济矛盾在缩小，在消失；最后，这些变化说明，这些社会集团间的政治矛盾也在缩小，也在消失。这就是苏联阶级结构方面的变化。

这就是过去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斯大林，1980：392—397）

这是斯大林1937年所做题为“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著名演讲中相关段落的缩写本（斯大林，1980：392—397）。^①

对于文中所涉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状况”，客观主义者倾向于将其当作是对一种完全独立于、外在于其所使用的话语系统而存在的给定事实来看待，并致力于探讨该文本是否对此一给定事实作出了“正确的”描画和陈述（正如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该文作者显然认为自己对这给定事实作出了“正确的”陈述，而其他一些客观主义者如结构功能主义者等则可能对上述陈述的客观事实性质表示质疑，认为它只是“一派谎言”）。

与客观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倾向于将文本1中就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状况的陈述看作是文本作者运用某些话语策略（词语[概念]策略、陈述策略、修辞策略以

^① 缩写的原因是原文太长。但为了便于此处分析起见，缩写版尽量保持了原文的风格。

及主题策略等)所进行的一种话语建构而已。譬如,在这一文本中(参见文本1),我们可以看到:

1.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一些具有特定含义和外延的词语来称呼自己在言说中所涉及的那些“社会集团”或由这些集团所组成的“社会结构”。

作者在这里使用了诸如“阶级”、“结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富农阶级”、“资本家阶级”、“知识分子”等来称呼自己在言说中所涉及的那些“社会集团”或由这些集团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只有在这些特定含义的基础上,上述文本的全部描述才能够得以成立。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并未就这些概念的内含和外延做仔细的说明和讨论,其隐含的前提是:它们已经是众所周知(普遍)且不容置疑(客观)的。

2. 陈述模式方面,作者大量采用了一种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且看上去属于客观直陈的语句来陈述文本所涉及的事件或现象,从而使一般读者倾向于将所有这些陈述的内容当作是一些不言自明的“事实”来加以接受。

此外,作者还多次采用“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是事实了”、“由此可见”这样一些“事实宣称”来引导或结束句子,大大缩小了读者对陈述内容进行质疑的想象空间。而短句(“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等)、排比句(“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等)等句型的反复使用,使整个文本读(或听)起来具有了一种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充满自信的感觉,也将读者(或听众)对有关陈述进行质疑的可能性尽量降到一个较低的程度。

3. 整个文本大量采用了一种表面看去逻辑推理极其严密的归纳主义的科学论证模式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如:(1)社会主义生产形式在我国工业中已经独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形式在我国农业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流通形式在我国商品流转领域中也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因此,社会主义体系在我国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完全胜利,现在已经是事实了”。(2)在我国,工业资本家阶级已经被消灭;农业中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已经被消灭;

流通领域中商人和投机者也已经被消灭;因此,“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3)在我国所有的剥削阶级都已经被消灭了;剩下的还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但这些社会集团也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陈述使得整个文本的叙述具有一种强烈的科学论证色彩,增强了对具有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信仰的那些读者或听众的说服力。

4. 从文本的整体来看,作者在内容结构方面采用了首先描述和说明苏联经济结构变化、然后紧接着再描述和说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论述方式,这种论述方式对于信奉“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命题的读(听)者来说其说服力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文本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苏联社会阶级结构所做的那些陈述是否能够被读者接受为是一种“客观事实”,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文本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话语建构策略。

(二)有关某个社会之分层状况的描述是对“社会分层”的现象进行符号或话语建构的产物

与主观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也不同,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看来,任何一份有关某个社会之分层状况的描述(包括描述者在进行描述时所采用的那些语词策略、陈述策略、修辞策略及主题策略等)也不是某些相关个人(普通社会成员、观察或研究人员等)纯粹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这些相关的个人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下对某些被称之为“社会分层”的现象进行符号或话语建构的产物。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诠释案例文本的作者为什么会采用他们所采用的那样一些话语策略,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地去考察和揭示在作者们的言说行为背后,约束和指引着其言说行为的那些话语系统及其相应的话语构成规则。

例如,就上述文本1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苏联社会阶级结构所做的陈述而言(包括作者在进行描述时所采用的那些语词策略、陈述策略、修辞策略及主题策略等),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看来,它既不是对某种纯粹给定的自然事实的描述,亦不是文本作者个人纯粹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作者在特定话语系统(即某一特定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指引和约束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1. 文本1的词语特征

阅读文本1的词句,读者可以发现该文所说的“阶级”至少具有这

样一个基本特征，即它是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相联系的，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所决定、可以且也必然随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的一些“社会集团”。显然，具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或特定含义）的“阶级”概念，只有在某一特定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话语系统（例如，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阶级分析话语系统）中才能够存在。因而，该文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苏联社会“阶级”结构所做的全部描述，也只有在这种话语系统中才能够成立并得到理解。

2. 文本 1 的陈述特征

在陈述模式方面，文本 1 的作者大量使用一种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且看上去属于客观直陈的语句来陈述文本所涉及的事件或现象，这虽然与属于演讲文体这一事实有关，但也与马克思主义这种话语系统从“理论必须掌握群众”这一观点出发而对话语之通俗化、大众化原则的强调有密切关联。对“大家知道”、“由此可见”等“事实宣称”的反复使用，只有在一种突出强调一切理论判断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话语系统（如科学主义的话语系统——前苏联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科学主义的话语系统）中才能具有意义并得到理解。而整个文本在读（或听）时所具有的那种从容不迫、铿锵有力、充满自信的感觉，也常常是各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或“解放”话语的基本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也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或“解放”话语之一）。

3. 文本 1 的修辞特征

在文本 1 中，整个文本大量采用那种表面看去逻辑推理极其严密的归纳主义的科学论证模式来“证明”自己的各项论点，这也只有在前苏联流行的那种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理解。

4. 文本 1 的论证特征

在内容结构方面，文本 1 的作者采用首先描述和说明苏联经济（所有制关系）结构变化、然后紧接着再描述和说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论述方式。正如前面已经暗示过的那样，如此结构安排只有在坚持“经济（所有制关系）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这一命题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那些不认同“经济（所有制关系）结构决定社会结构”此一命题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或诸多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中，这一论述方式都是被质疑的。

概而言之,文本 1 的各种话语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前苏联流行的那种特定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所内在包含着的。文本 1 正是作者在这样一种类型之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下建构出来的。它既非对一种纯粹给定事实的再现,也非作者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产物。因此,只有在对约束和指引作者建构此文本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有所了解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对此文本的内容与性质有比较适当的理解。

(三)某一社会现象的话语建构过程本身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

对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来说,某一社会现象的话语建构过程本身也被认为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而非某种唯一的可能性。因此,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话语分析工作也就应该尽量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话语分析工作应该尽量将社会现象之话语建构的多种可能性揭示出来、展现出来,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这种话语建构性质,意识到自己原本所在的那种话语系统的局限性,从而跨越自身所在话语系统的界限,达到一种对事物或社会现象的多元化的理解,以及对他人之话语世界的理解,进而实现不同话语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谐共存。

譬如,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状况,我们就可以有与前述文本 1 所做描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描述。文本 2 即为一例。

文本 2:

斯大林关于苏联已经消灭了对抗性阶级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存在着与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抗。首先,在苏联存在着与美国社会类似的由地位及利益差别而形成的对抗性阶级结构。与美国一样,在苏联也存在着一个上层阶级(或官僚特权阶级)。这是苏联社会的统治阶级。它由共产党的常设机构、政府机构、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工会、青年团等)以及军队等不同领域中的官员们以及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医生等)所组成。他们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并因此而享有苏联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最高的工资收入、宽敞的住宅乃至别墅、专用的高档轿车、在专用商店里购买某些免税进口奢侈品、享受最好

的医疗服务以及子女进入某些最好学校学习的特权等)。与美国一样,在苏联也存在着一个中间阶级,它由上述党、政、军、企、学、社会团体等领域的管理部门中的白领职员、一般的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学校教师、文艺工作者、医生等)以及企业和农场中的熟练技术工人等组成。这些人虽然并不享有上层阶级所享有的那些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但却享有下层阶级望尘莫及的那种职业地位以及工作和生活待遇(干净优美的的工作环境、轻松的工作类型、较高的工作报酬、较好的住房和医疗服务待遇等)。与美国一样,在苏联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个数量相当庞大的下层阶级(或劳动阶级)。它由那些普通的工厂工人和农庄庄员所组成。他们不仅不享有任何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而且在工作和生活方面也只享有最基本的一些待遇(较差的工作环境和类型,较低的工资和劳保福利,较差的住房和医疗服务待遇,子女只有到普通学校就学的机会等)。其次,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正如美国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和美国社会一样,在苏联社会中我们也就同样可以观察到被支配阶级对支配者阶级所进行的反抗斗争,只不过这些斗争的形式与美国社会中所发生的同类斗争有所不同。^①

显然,这一文本对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提供了一种与文本 1 完全不同的描述:其一,在文本 1 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苏联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力的成员”的“两阶级一阶层”;在文本 2 中则是“上层(官僚特权)阶级”、“中间阶级”和“下层(劳动)阶级”被认为是“如美国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的三个阶级——不仅存在着地位和利益方面的巨大差别而且处于“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的关系”之中。其二,在文本 1 中,工人阶级被描述为社会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包括官员在内)则都属于被领导阶级;而在文本 2 中,“官员”和部分著名知识分子被归属于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另外一些知识分子也被置于一个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处于工人、农民之上的“中间阶级”,工人阶级却和农民阶级一起被归属于被统治的下层阶级,等等。

^① 此一文本系作者虚构,但与此文本一致的思想观点则可参见雷蒙·阿隆,2003。

有人一定会问：在文本 1 和文本 2 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所做的这两种描述之间，哪一种描述才是更为真实的呢？对于深受现代主义科学观念影响的人们来说，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现代主义的观点，对于同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真实（或最接近正确）的答案。只有这个答案才配叫做“真理”，其他的那些答案只能被称做“谬误”，属于应该被排斥、被放弃之列。然而，对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来说，这样的提问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看来，和文本 1 一样，文本 2 无疑也不应该被视为是对某种纯粹给定事实的再现，而只能被视为作者运用一定的话语策略所进行的一种话语建构而已。例如：

1. 文本 2 的词语特征

在文本 2 中，作者也使用了“阶级”、“阶级结构”、“阶级对抗”以及“上层阶级”（或“官僚特权阶级”）、“中间阶级”、“下层阶级”（或“劳动阶级”）、“对抗性阶级”等词语作为关键词，而且作者开宗明义便提出要与斯大林就苏联社会的阶级状况问题进行商榷，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作者似乎的确是在与斯大林辩论同样的问题，其所使用的“阶级”、“阶级结构”、“阶级对抗”等词与斯大林所使用的相同词语在含义上要么是大体相同、没有本质区别的，要么是比斯大林采用的含义更为合理（否则便不构成对斯大林的批评了）。

2. 文本 2 的陈述特征

在陈述模式方面，作者同样采用了一种表面看上去属于客观直陈的表述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类似”，“在苏联也存在着一个上层阶级”，“这是苏联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地位和享有苏联社会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工作和生活待遇”，“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等），仿佛作者所陈述的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一种已经得到确认因而无需再加以甄别的给定性事实。而最后一句话“我们也就可以同样观察到”对“我们”一词的使用，于不知不觉当中将读者也纳入到陈述主体之中，更给读者以这样一种信息，即：只要你愿意且有条件去观察，你就能够观察到这些事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所述内容的可靠性。

3. 文本 2 的修辞特征

在文本 2 的整个行文过程中，作者反复使用了“与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类似”、“与美国一样”、“正如美国社会”等短语来引导有关句子，对

于许多对作者们的话语建构策略缺乏足够警醒意识的读者来说，这些引语无疑也将具有非常强烈的诱导效果，使读者常常于不经意之中将这些短语所引导的那些内容当作是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接受下来。

4. 文本 2 的论证特征

总体上看，文本 2 主要采用了一种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归纳主义的逻辑策略（“在苏联存在着与美国社会类似的由地位及利益差别而形成的对抗性阶级结构”，“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也正如美国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来对全文的主题（“苏联社会有着与美国社会同样的阶级状况，因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阶级状况所做的概括是不正确的”）进行论证，使得对现代归纳逻辑比较信任的读者易于接受作者的论述。

同样无疑的是，与文本 1 一样，文本 2 对苏联社会所做的描述也只有在这种特定的话语系统之中才能够成立并得到理解。具体说来：

1. 只要我们细读一下文本 2 便不难发现，该文本中所使用的“阶级”一词与文本 1 中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在含义和外延上是完全不同的。在文本 1 中，“阶级”一词指的主要是由对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所形成的不同社会集团，而在文本 2 中，“阶级”一词则指的主要是由于权力（权威）及工作和生活条件（包括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不同社会集团。因此，文本 2 显然属于一个与文本 1 所属话语系统相当不同的“阶级”话语系统。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当不同的“阶级”话语系统中，文本 2 关于苏联社会所做的全部叙述才是逻辑上能够成立和可理解的；离开了这一话语系统，文本 2 的全部陈述在语义方面的合理性都当受到质疑。

2. 作者对表面看去属于客观直陈之表述方式的大量使用，则也只有在这种突出强调一切理论判断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话语系统中才能具有意义并得到理解（现代社会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多数话语系统均属此类）。

3. 反复使用“与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类似”一类的短语来引导句子，其实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即：苏联社会也好，美国社会也好，作为现代工业社会，其“阶级状况”事实上只与其工业化的状况相关，而与各自的所有制状况无关。显然，这种理论预设是 20 世纪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或“工业社会”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在这样一些话语系统中，作者对这一修辞手段的反复采用才是一种可以得到较好

理解的话语行为。

4. 作者运用归纳主义的逻辑策略来对全文的主题加以论证, 自然也只有在这种话语系统中才得以理解; 在这一话语系统中, 归纳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可以相信的逻辑论证方式; 只要严格遵守若干必要的逻辑规则, 运用这种方法来对某一命题进行证明, 其结论就应该被认为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 与文本 1 一样, 文本 2 也只是文本作者在某种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下运用某些话语策略而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 把它所描述的那些内容看作是对某种纯粹给定之社会现实的再现也是不适当的。尽管在各自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内, 它们对苏联阶级状况的描述都可能是“真实”的; 但在其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外, 则都是不能成立且是难以理解的。

(四) 话语的反本质主义特性

有人可能会坚持说, 即使我们承认“关于苏联社会阶级状况的不同描述在各自话语系统范围内都可能是真实的”这一看法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 但在帮助我们更适当地了解和理解苏联社会的阶级状况方面, 这些不同描述的地位和意义应该还是有差别的吧?

事物拥有多方面的属性, 不同的话语系统可能有助于我们揭示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属性(因此它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述就可能如上面所说的那样都可能是真实的), 但这些属性本身在事物中的地位和作用则不一样, 有的属于事物的本质属性, 有的则可能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已。而只有对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了描述的那些文本才是更为重要的文本, 反之就只能是一些次要的文本。假如这种看法不错的话, 那么, 在文本 1 和文本 2 及其分别所属的两个不同话语系统之间, 到底哪一个可能才更为重要呢? 或者说, 到底哪一个才揭示了苏联社会阶级状况的本质特征呢?

多元话语分析学者认为, 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不适当的。作为这样一个问题之理论基础的本质主义其局限也早已为人们所揭示。按照这些人的观点, 我们所能言谈的一切对象都是由我们的语言符号建构出来的(而非某种在语言符号之外或之前存在的给定的实在), 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及其指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同一符号完全可以和不同的所指及其指涉相联系), 因此在某一符号的不同用法当中没有任何一种

可以被认定为比其他用法更好地揭示了某一给定对象的“本质”（可以说它们都揭示了或者都未揭示其对象的“本质”）。

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坚持认为，在文本 1 及其所属的话语系统和文本 2 及其所属的话语系统之间，只有前者才真正揭示了苏联社会阶级状况的本质特征，而后者则完全是对苏联社会现实的歪曲。而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只有前者所使用的“阶级”概念才真正地揭示了“阶级”现象的本质特征，即“由对（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所形成的不同社会集团”。

那么，为什么只有将阶级定义为“由对（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所形成的不同社会集团”才是揭示了“阶级”现象的“本质”呢？对于这一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些大致相同的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类理由：

第一，在人们之间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地位差别中，有许多差别（如在劳动组织中所起作用方面的差别、在生产体系中所居地位方面的差别、在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数量方面所具有的差别，以及在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方面所具有的差别等）都主要是由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所决定的，是以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为基础的。正如前苏联的一本教材所认定的那样：“对生产资料的不同的关系是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特征，由此产生出阶级的其他一切特征，包括各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各阶级的收入的数量和来源的不同”（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9：500—503）。

第二，在由各种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别之间，由物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别才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或者说是人类社会中最不合理、最应该加以消除的差别。由其他因素（如种族差别、生理差别、年龄差别、性别差别、职业差别、技能差别、知识差别等）所导致的地位差别则不具有此种重要意义或性质。大概正是出于这种看法，马、恩、列、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曾严厉批评过那种试图把一切社会差别都加以消除的“平均主义”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平等仅仅是“消灭阶级”（即由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不平等），否则就是一种“无稽之谈”或者“一种极端愚蠢而荒谬的偏见”（斯大林，1980：335—336）。

这两类理由，前一个属于事实判断，后一个则属于价值判断，尽管经过多次重复后可能有不少人已经将其视为当然的“真理”，但其实它

们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容置疑。

首先,对于第一类理由,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即使是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系统内部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例如,于20世纪,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存在着“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的分离,面对这种普遍现象,一切认为“人们之间的社会差别都是由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所决定的”之类的看法均无法自圆其说。

其次,对于第二类理由,我们也不得不说,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们也只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系统之内才能够成立和得到理解。因为只有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系统中,由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才被视为是一种最重要、最具根本性质的社会关系。离开了这种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系统,由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就不具有这样的意义,上述第二类理由也就根本不能成立。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的话,那么我们也确实没有无可置辩的理由来坚持说只有源于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的那种社会地位差别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社会差别。

而如果我们承认:第一,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差别并非都是由对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别所造成的——这仅仅是人们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差别当中的一种类别;第二,在由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差别与由其他因素(如种族差别、生理差别、年龄差别、性别差别、职业差别、技能差别、知识差别等)所造成的社会差别之间在重要性、合理性等方面从长远的时间范围内来看并无根本差异的话,那么,在上述文本1(及其所属话语系统)与文本2(及其所属话语系统)之间,就不存在着何者更为重要、何者更好地揭示了所述对象的本质一类的问题。它们所揭示的,都是其所属话语系统为其所规定的那一对象的本质属性。

此处就上述文本1和文本2(及其各自所属话语系统)之间关系所得出的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有关阶级状况的文本(及其所属话语系统)之间的关系。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五)关于普遍性与综合性话语的建构问题

有人或许还要问,假使我们承认文本1和文本2属于两个同样有

存在之合理性的话语系统，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上述两个文本（及其所属的话语系统）进行整理概括，得出一个比两者更具综合性、普遍性的文本（乃至话语系统），以用来指导和帮助我们研究和理解有关“阶级”的文本和话语呢？

对于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们的答复将可能是：同样不能。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当我们说某两个或几个文本是对某一“对象”的不同话语建构时，首先就意味着这些文本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差异（或库恩所谓的“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两种或几个文本之间在叙述主题以及关键词义等方面的差异可能是完全无法也不应该消除的。

以上述关于苏联社会阶级状况的两个文本为例：虽然这两个文本的主题表面上看都是关于苏联社会的“阶级”状况，但两者所说的“阶级”一词在内含和外延上却完全不同（不可对译），由此得出的对苏联社会之阶级状况的描述和判断也就完全不同。与此相应，这样的两个文本在其所具有的社会建构效果方面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依据文本 1，“阶级”差别主要是存在于工、农两大阶级之间，原因主要在于这两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完全一样，他们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完全一样，他们取得收入的形式也有差别”，消除这种阶级差别的措施也主要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对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进行调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59：588—599）。而依据文本 2，“阶级”差别则主要是存在于权力与技能的不同拥有者之间，原因主要在于权力和技能拥有方面的不同，消除阶级差别的措施也主要是促进权力和技能拥有的平等化。所有这些差异，在我们试图对它们进行归纳和概括时都将一一消失，从而使得我们归纳和概括所得到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

不仅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将各种本不相同的话语进一步综合成为一些更具一般性、普遍性的话语，还会在话语内容之间造成一种等级制度，使那些被认为不具一般性、普遍性的内容受到压制和忽视，从而导致对话语之间内容关系的简化管理。

对于后现代主义者们的这种看法，本文作者并不完全认同。若仔细比较和思考上述所列的两种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它们在话语策略方面有着种种差异，但透过或过滤掉这些话语策略方面的差异，我们似乎还是可以在二者的内容之间发现某些“无可争议”的共同之处。譬

如, 不管它们在对“阶级”的界定方面有多大差异, 它们所说的“阶级”都是指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 也不管它们对苏联社会之“阶级”状况的具体描述有多少不同, 它们都意在表明苏联社会的成员在社会地位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等等。由于这样一些共同之处的存在, 使得我们还是可以在特定的意义上将这样两个不同文本的内容进一步加以归纳和概括; 而这样的归纳和概括也会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只要我们明白由这种归纳和概括所得来的一般性知识并不高于(优于)、也不能替代那些未被归纳和概括进来的特殊性知识即可。

那么, 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在做进一步的讨论, 即: 导致这两个文本(如文本 1 和 2)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现代主义社会学者们一般认为, 不同文本之间共同之处的存在表明, 确实有着一种独立于话语系统之外的给定性实在(在此处即是有关“社会分层”的现实)。这些不同的文本, 或者是再现了这一给定性“社会分层”现实在不同时间条件下的状况, 或者是再现了其在不同空间条件下的状况, 或者是再现了它在同一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不同侧面, 等等。似乎正是这种独立于话语系统之外的给定性“社会分层”现实构成了不同话语/文本言说的共同对象, 从而使得无论在何种话语系统之下来言说“社会分层”的那些文本之间都会有着一定的可通约之处。然而, 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认为这种推论在逻辑上并不必然成立。不同话语/文本内容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或可通约)性并不必然要以某种独立于话语/文本之外之客观实在的存在为前提。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看来, 构成不同话语/文本内容之间某种程度共同(或可通约)性之前提的并不是某种独立于话语/文本之外的客观实在, 而是不同话语/文本都可能共同隶属的某个抽象层次更高的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可能已经存在, 也可能还未存在、有待形成; 当我们将一些本不属于同一话语系统的文本综合起来, 把它们看成是对某一“共同对象”之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存在状况或同一时间、空间条件下不同侧面的刻画时, 我们实际上就可能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与已有的话语系统相比可能更加具有综合性或普遍性的话语系统。正是这一抽象层次更高的话语系统, 才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的“现实”, 使我们得以把原本属于不同话语系统的那些文本所刻画的“社会分层”图景, 理解、诠释、建构成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分层”状况, 或同一时空条件下社会分层结构的不同侧面, 等等。因此, 当我们发现某些不同话语/文本之间可

能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时，不是要把这些共同之处当作某种纯粹给定的客观或主观性实在来加以确认，而是要进一步探究和揭示作为这种共同性之前提或基础的、这些不同话语/文本所共同隶属的那一抽象层次更高的话语系统。对这样一种更高层次的话语系统做进一步的探求或建构也就同样将成为多元话语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①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与客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主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之间最主要的一些区别简单概括如下：各种客观主义的社会分层模式将“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各种主观主义的社会分层模式则将“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客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的支持者们在对“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主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的支持者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建构为“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多元话语分析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阶级”或“社会分层”现象的全新视角，而且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或“客观分析法”和“主观评价法”）这两种社会分层研究模式提供了一种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新思路。

如前所述，在持客观主义立场的那些人看来，只要程序和方法无

^① 以上对社会分层现象之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描述，虽然是以一些由某些作者撰写的书面文本中的话语为例来进行的，但其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以其他各种文本（例如访谈记录）形式出现的话语，只不过用于分析的一些具体技巧可能需要发生变化（例如，可能需要采用谈话分析的一些技巧等）。

误,以各种客观主义分层模式对人们的社会地位进行划分时所得到的那些“阶级(层)状况”,一般说来,应该正是某时某地社会分层状况的“真实”描述。从主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出发的人则一般认为:所谓“真实”的“阶级(层)状况”就像“国家”等社会现象一样,其实也只存在于相关社会成员个人对它的主观想象或取向当中,并不存在某种独立于、外在于这些主观想象或取向的纯“客观”的“阶级(层)状况”。那些被持客观主义立场的人认定为某时某地“阶级(层)状况”之客观真实描述的社会分层图景,其实也只不过是这些描述者们自己对此时此地社会分层状况的一种主观想象或取向而已,而绝非像他们自己认定的那样是对什么客观给定之社会分层状况的“真实”再现。就像在对“自杀”现象的研究领域中所出现过的情况一样,把这种本也为某些人之主观想象的“阶级”或“社会分层”图景看作是一种纯粹给定的客观现实,也将导致对社会分层“现实”的一种误解或曲解。然而,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视角来看,对“客观分析法”的这两种看法都是不适当的:用“客观分析法”得到的社会分层图景,其实既不像客观主义社会分层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某种纯粹给定的“社会分层”状况的实际再现,也不像主观主义社会分层论者认为的那样是对某种社会分层现实状况的一种误解或歪曲,而是和用各种“主观分析法”所得到的那些社会分层图景一样,都是某些相关社会成员在特定社会分层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之下、运用某些话语策略所完成的对某时某地之“社会分层”状况的话语建构而已。因此,在各种“客观主义社会分层模式”指引下用“客观分析法”对某时某地之社会分层状况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既不比用“主观分析法”所得到的那些分析结果更为“真实”,也不比后者更为“虚幻”。

与上述争论相关联,对于用“主观分析法”所得到的“阶级(层)状况”,持客观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它实际上反映的只是人们的“阶级(层)意识状况”,而非“实际”的“阶级(层)状况”本身;作为对人们“阶级(层)意识状况”的一种反映,即使在准确无误的情况下,它与“实际”的阶级(层)状况之间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偏离”;因此它只能作为我们了解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社会分层状况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不能被看作是对此时期、此地区社会分层状况的“真实反映”。相反,持主观主义观点的人则认为,由于“阶级(层)”这种“社会现实”就像其他所有那些社会现实一样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当中,因此(在调查结果大致准确的情况下)它(并且只有它)所反映的才是此时此地“阶级(层)状况”的真实

情形。然而，和上面讨论“客观分析法”时一样，如果我们换一种观点，以多元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来重新看待“主观评价法”，我们也就应该意识到，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社会分层”状况本身，既不像客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对“阶级(层)意识状况”的反映或再现，也不像主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惟一可信的“现实”。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关于某时某地之“阶级(层)”状况的结果，其实也只是被调查、被访谈的那些对象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就我们所谓的“阶级(层)”主题所进行的一些话语建构。这些话语建构，一方面，在它们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内，正像主观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的确就是一种“事实”本身。但在其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外，也就可能难以被理解和被承认为“事实”。它和其他人以其他调查方式(如客观主义调查方式)所获得的、被认为是社会分层“实际”状况的那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作为反映的“主观意识”和作为被反映对象的“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惟一可信的“现实”同被扭曲、被强加于人的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只不过是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它们应当具有同样的虚构性或“真实性”。

概而言之，无论是“客观分析法”，还是“主观分析法”，如果我们按照它们的倡导者们原来所阐述的那种性质来理解它们，把它们看作是对纯粹给定的“社会分层”(之“客观”或“主观”)状况的再现，都有可能造成对分析结果的误解。而只要我们意识到它们所具有的“话语建构”性质，那么，它们就都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分层研究模式。可见，在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多元话语分析也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与以往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相当不同的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参考文献：

- 艾思奇主编，1962，《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
- 布哈林，1983，《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 布劳，1988，《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布劳、邓肯等，2005a，《职业地位测量》，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5b，《分层过程》，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北京：华夏出版社。
- 戴维·波普诺，1988，《社会学》，刘云德、王戈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戴维斯、莫里，2005，《分层的一些原则》，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北京：华夏出版社。
- 恩格斯，1995，《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戴维·格伦斯基编, 2005《社会分层》,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E. O. 赖特, 2004,《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 陈心想等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 2005a,《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结构概念》, 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 2005b,《阶级结构分析的一般性框架》, 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 2006,《阶级》, 刘磊、吕梁山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雷蒙·阿隆, 2003,《阶级斗争: 工业社会新讲》, 周以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具海根, 2004,《韩国工人: 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梁光严、张静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强, 1993,《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 李春玲, 2001,《过渡时期的城镇社会阶级结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 2005,《断裂与碎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 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 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列宁, 1995,《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伦斯基, 1988,《权力与特权: 社会分层的理论》, 关信平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刘欣, 2004,《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克思, 2003,《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 1995a,《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1995b,《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钱乘旦, 2001,《汤普森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斯大林, 1980,《斯大林选集》(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59,《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下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汤普森, 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钱乘旦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谢立中, 2006a,《职能关系与财产关系: 两重性质还是两种关系》,《社会理论: 反思与重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2006b,《走向“多元话语分析”: 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社会理论学报》第2期。
- , 2007,《实证、诠释与话语: 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的分析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4期。
- 韦伯, 1993,《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顾忠华译,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 1997a,《经济与社会》(上卷),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1997b,《经济与社会》(下卷), 林荣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沃纳等, 2005,《美国的社会阶级》, 戴维·格伦斯基编,《社会分层》,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赵光武、李澄、赵家祥, 1982,《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Aminzade R. 1981, *Class, Politics, and Early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ubuse Fran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3, *Ballots and Barricades: Class Formation and Republican Politics in France, 1830—187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 Dahrendorf, R.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 Goldthorpe, J.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Haragan, M. 1989, *Nascent Proletarians; Class Form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 Katznelson, I. & A. Zolberg 1986,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arkin, 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1974 *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c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 1954,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Poulantzas, N. 1989, “On Social Classes.” in Giddens, A. & D. Held (eds), *Classes, Power and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ber, M.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s.) by Guenther Roth &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张宛丽

century, and became significant acade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special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sociality of “suffering” established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rdinary life of common people and the macro social history, and showed the need of revealing the roots of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hip. When we consider civilization as everyday-life practice of common people, the life history of peasants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macro social history, and their trivial stories as organic parts of grand narrative, can be provided with extraordinary meanings. That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Analyzing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phenomenon as an illustration *Xie Lizhong* 68

Abstract Objectivists view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s the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given to and independent of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ity of a society’s individual members. Subjectivists consid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as a “subjective reality” made up by individual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ontrast to both “objectivists” and “subjectivists”,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ts tak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s a “discourse reality” constructed by specific social members with certain specific strategies when constrained and guided by a specific discourse system. Correspondingly, objectivists always focus on exploring the “objective laws” controlling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ubjectivists are always committed to the study of thos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es whereas pluralistic discourse analysts are calling for the study of those discourse strategy and system.

The “Establishing Schools with Temples’ Assets” Movement and The Transition in Village Power in Late Qing: The case of Baixian county
..... *Liang Yong* 102

Abstract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movement of “establishing schools with temples’ assets” led by the government was widely accepted and practiced in rural society. Its biggest influence on the rural power structure is the appearance of Xuedong, a post empowe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aused constant lawsuits in local societ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ise of schools is coincident with the transition in local power structure.

On Individual Welfare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te and Society
..... *Yang Weimin* 120

Abstract Social welfar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pursuit of human fundamental value.